

C

hinese Literary Theory
of 1930s

20世纪30年代的 中国文学理论



张清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

hinese Literary Theory
of 1930s

20世纪30年代的 中国文学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张清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61-6629-1

I. ①2…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007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牛玺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0.75
插页 2
字数 326千字
定价 7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逻辑限定与方法说明	(1)
第二节 本研究对象的社会场域状况	(4)
第三节 本研究对象的社会系统特征	(8)
第一章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理论的生成语境	(11)
第一节 权力斗争与文学理论生态	(11)
第二节 文化生态与文学理论形态	(17)
第三节 文人处境与文学理论生产	(28)
第二章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理论的生成机制	(37)
第一节 文学理论的商业生产机制	(37)
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教育生产机制	(47)
第三节 文学理论的传播流通机制	(56)
第三章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文化症候	(68)
第一节 认识的混乱与科学精神的贫困	(68)
第二节 课程的错置与教育建制的混乱	(80)
第三节 经世致用心态与理论实用选择	(83)

第四章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理论的精神生态症候	(91)
第一节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黯淡	(93)
第二节 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落寞	(106)
第三节 现实主义文艺论的认识歧途	(118)
第五章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理论的权力话语症候	(134)
第一节 文学理论话语场域的权力对峙	(136)
第二节 文学理论话语场域的权力争战	(157)
第三节 文学理论场域内的亚政治话语	(188)
第六章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话语的叙事特征	(212)
第一节 左翼文学权力话语的叙事特征	(213)
第二节 左翼文学学术话语的叙事特征	(227)
第三节 左翼文学批评话语的叙事特征	(256)
第七章 20 世纪 30 年代京派文学理论的文化表征	(281)
第一节 文化冲突与文学道德重铸	(282)
第二节 京派文学理论的精神向度	(290)
第三节 京派文学理论的自律诉求	(305)
结语 理论缺陷与后设反思	(318)
参考文献	(323)
后记	(326)

引 论

第一节 研究的逻辑限定与方法说明

立论之前当先“正名”，亦即对立论伊始所用的概念给读者以交代。“名正”（概念清晰）则“言”（表达、论证）“顺”（流畅、清晰），“名不正”则“言”必“不顺”。

首先向读者交代一下本书的名称及书名中两个概念的使用方法。本书是作者主持承担的 200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语境与文学理论形态生成——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为了便于读者把握书的内容和题旨，就换成了眼下这个名字。在这一名字中，有两个概念及其用法不能不对读者加以特别交代：一是“20 世纪 30 年代”这一时间概念，二是“文学理论”这一逻辑概念。在时间概念上，本书在谈到“20 世纪 30 年代”时，简称一律采用“30 年代”的写法；其他年代的简称亦依此例。在逻辑概念上，“文学理论”的学科和知识发展在当时尚未成熟，“文学理论”、“文艺理论”两个概念在该时期不同批评家、理论家那里称谓不一，其概念的所指内涵也不一致。因此，作者在行文之时，将根据所引文献资料情况和论证语境所需来使用“文学理论”或“文艺理论”。

其次向读者说明一下本书对文学理论创造者的称谓用法。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理论学科建制尚未成形，职业文学理论学者寥若晨星。许多理论主体兼有多重文学身份，他们虽然在创作、批评、理论等领域均有创获，但其

主要成就和贡献不是理论而是创作，如鲁迅、沈从文、李健吾等；对这类人用“理论家”这样的学术专名进行身份定位显然有悖常识。为了避免这种逻辑尴尬，本书在一般情况下采用“文人”这一通名；对个别主体据具体语境需要用“批评家”或“理论家”这样的学术专名称呼之。

最后向读者交代一下本研究对象的时段规定、注释方式以及研究采用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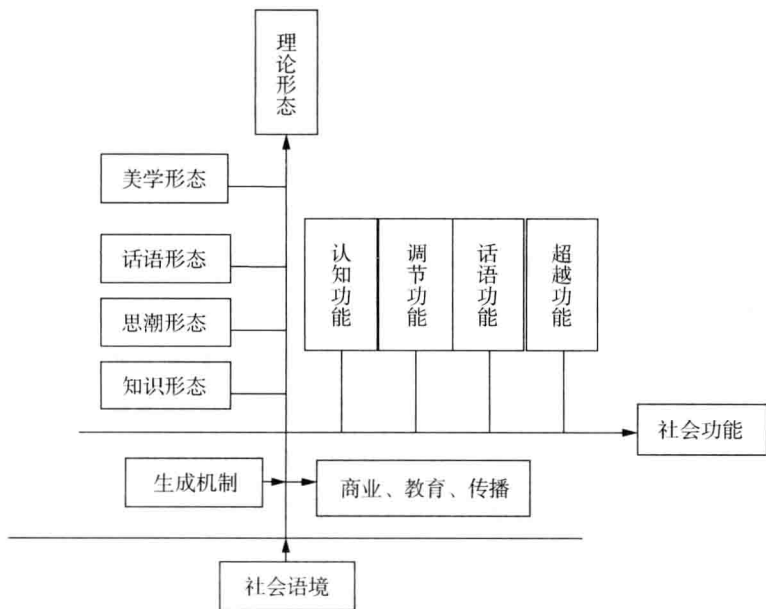
在时段规定上，本书采取自然时间截面方法，把“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间范围限定在 1930—1939 年这 10 年期间，而非以国人习惯的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史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把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几年也划到 30 年代之下。既然以 1930—1939 年为界，那么本书在文献取舍上自然以这 10 年期间的材料为准；除个别不得不用 20 年代末的背景材料，本书所用 30 年代的文献资料基本限定在 1930—1939 年期间。

在文献注释上，为了给读者以明晰的时间直观感，也为了读者便于把握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思想的时间流程，本书材料出处尽量以原始刊发的报刊为主。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尝试采用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网络矩阵”方法，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理论加以描述分析。如果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网络结构，那么文学理论及其相关的社会背景可以用一个矩阵图式表示。这个矩阵图以社会语境为底盘，以纵、横两个坐标轴分别表示文学理论的形态类型与社会功能，图例如下：

这个矩阵图只是社会网络关系的粗略结构。如图所示，纵轴中的理论形态还可细化为具体的理论类型，如思潮形态可分解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横轴中的每种理论功能还可分解为相关的具体社会功能，例如，文学理论的话语功能可具体化为叙事功能、宣传功能、规训功能、批判功能等。这一结构图式虽然粗略，但它所指示的文学理论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成分却一目了然。文学理论的形态类型及其社会功能，文学理论形态、功能及其生成机制，文学理论的形态、功能及其生成语境，它们之间形成了多重组合关系。这一图式结构为本书提供了一个简明的逻辑描述框架。

位于社会网络矩阵底盘的结构因素是“社会语境”。社会语境是文学



理论的生成始基，本研究以之为发端。由意识类型赖以生成的社会存在出发开始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常规思路，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习惯：由远及近，由外入内，由表入里。如以科学哲学的理论为参照，社会语境相当于波普尔所说的“第一世界”^①，亦即影响文学理论生成的客体世界。之所以使用“相当于”一词，是因为人文形态的社会环境不同于自然形态的物理环境。社会生活中的权力斗争、文化生态、文人处境等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主观因素造成的。

位于社会语境之上的结构因素是“生成机制”。文学理论的生成机制相当于波普尔所说的“第二世界”，这是一个与社会主体息息相关的世界，也是人与物、客观与主观、精神与物质交联系的世界，里面有过多的主体经验因素的介入。正是相关主体的经验状态与经验类型，影响并决定着文学理论的风格、面貌、形态。在研究文学理论的生成机制时，既要注意到作为主体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要注意相关客体对象的社会属性。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对文学理论的形态类型、话语特征作

^①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说参见其《客观知识》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出准确的判断。

位于生成机制之上的结构因素是“理论形态”与“社会功能”，这两个结构因素是本课题分析的重心。形态、功能领域相当于波普尔所说的“第三世界”，这是一个人类自我创造出来的精神世界，它们虽然受制于社会语境与生成机制，却又有它们自己之间的运行规则：此种文论形态对应于彼种社会功能，而此种社会功能是彼种文论形态的产物。当然，文论形态与社会功能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对于一种形态的文论来说，它会显现某些功能，弱化另外一些功能；而对另一形态的文论来说，其他理论所忽略的，可能正是它所要强调的。换言之，不同的理论形态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就是对同一种理论来说，它所关注的社会功能也往往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而变化。研究者在对各种理论形态的性质、特征、结构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描述分析时，不能不注意到上述特征。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网络矩阵结构中，社会语境、生成机制、理论形态、社会功能四种因素共同构成了彼时社会生活的物质—精神网络集群，“认知”、“调节”、“话语”、“超越”等因素则是这一集群结构要素中的思想“结点”。30 年代中国文论的诸种问题表征，皆与上述结点有关；30 年代文学理论问题的诸种分析，也将紧紧围绕上述结点展开。

第二节 本研究对象的社会场域状况

文学领域是一个由各种社会地位的人们共同构成的多维活动空间，是整个社会精神生态空间中的分支区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称之为“文学场”。根据布迪厄的看法，文学场根本不是常人所说的“象牙塔”，而是一个充满斗争与较量的社会“权力场”，“权力场是各种因素和机制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也“是不同权力（或各种资本）的持有者之间的斗争场所”^①。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情形确乎如此：当时的文学场作为文学主体职业角色与社会地位的结构化空间，既是

^① [法]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3—264 页。

他们施展自身力量的舞台，也是他们与其他社会主体得以产生社会联系的活动空间。

文学场“作为一种场域的一般社会空间，一方面是一种力量的场域，而这些力量是参与到场域中去的行动者所必须具备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斗争的场域；就是在这种斗争场域中，所有的行动者相互遭遇，而且，他们依据在力的场域结构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斗争手段、并具有不同的斗争目的。与此同时，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持或改造场域的结构而分别贡献他们的力量”^①。作为特殊的社会权力场，文学场是一个充满利益斗争的社会空间，不同类型的精神投资者将其相应的社会资本注入其间，并以这些资本的力量，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情形而论，注入文学场的资本成分，有经济层的商业资本（金钱投入），有行动层的个体象征资本（身份、地位、影响）和群体政治资本（团体影响、政体力量）。不同类型的资本及其力量在文学场中集聚、交汇，其斗争目标表现为不同的权力意图：政府或政治家希望得到的是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能力，商人、企业家希望得到的是经济利润，文学家希望得到的是自己倡扬的艺术观念得到传播和推广，文学投机者则想名利双收，提升自己在文坛的地位及影响。

文学场为文学理论资源的配置、生产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不同通道，文学理论的生产、流通、消费正是在这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力量场域内进行的。在 30 年代文学场内，文学理论主体的个人身份与其所处的集团位置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由此体现出的政治关系和利益格局也十分复杂；文学从业者因其身份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不同，其所操持的理论话语类型也各不相同。受各自所属的政治组织的规约，左、右两翼文人均以政治诉求作为文学活动的目标，其理论成果具有强烈的话语特征。国府的文人拿着国家的俸禄，自然要为政府说话，在立论时常常秉承国府宣传机构的旨意，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为目的。即使那种旨意和统治秩序很不合理，他们也会从理论层面为之强辩甚至诡辩。左翼文人作为文化领域里的造反

^① 转引自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8 页。

者，其立论自然以自己所在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自己所在政治集团的政治目标为根基，同时以中共宣传机构的政策和要求为依据。和国府文人的文章一样，左翼批评及理论同样以话语斗争为宗旨，而不以推动文学发展或文学知识建构为目标。自由主义者的文学活动有两种：有政治立场的自由主义者虽不参政，却喜议政，他们对国府政治指指点点，并对国府的文学干涉政策常表不满；无政治立场的自由主义者追求文学自由，对国共两方的文艺争战均无好感，他们以审美创造和知识推进为目的，即使有时身陷国共之间的政治文艺论争，也秉持理性态度和科学精神，不偏不倚，客观论议。但是，学术上的中间立场同时遭受国共双方政治文人的不满和非议。大学教授的文学生涯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作为专业知识分子，享受着政府供给的丰裕薪俸，安居于象牙塔内，一边传播知识，一边对相关知识据世情进行修正、补充或更新。

在整个 30 年代，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的权利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斗争在文学场内的表现就是文学论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由于论战的目的不是为了科学辨析文学问题，而是为了保卫各自阵营的阶级利益，因此论争各方在论争过程中常常政治意气当先，以谩骂、攻讦甚至造谣、中伤代替理性的逻辑分析。由于攻击、骂娘式批评成为积习，以致一些批评家对待非敌对对象也习惯性地加以谩骂和人身攻击。典型如左翼批评家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谩骂，对“论语派”的冷嘲热讽，对“于抗战无关”和“反差不多”论的呵斥。左翼内部围绕“两个口号”展开论争时，个别极左文人还习惯性地把这一套方法用到了自己战友身上。

30 年代文学理论斗争的背景、原因颇为复杂：有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左右两翼的理论对攻），有审美观念的冲突（京派与海派的互相批评），还有审美观念与政治环境错位导致的误会式批评（反“于抗战无关”与反“反差不多”论）。有趣的是，左、右两翼文人在论争时确乎是依据在文学场“结构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斗争手段、并具有不同的斗争目的”。

30 年代中国文学场内因素的异质与多元并没有导致文学理论的昌盛，因为思想的昌盛是以思想对政治的疏离以及政治家不干涉思想的发展为前

提，舍此前提不可能出现思想繁荣的局面。无论在什么时代，精神领域里的规训和整一在形成意识形态统一的同时，必造成思想的萎缩和僵化，无论这种规训方式是“焚书坑儒”的政治硬暴力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软暴力。此外，学术自身的话语排斥和话语挤压之类的精神软暴力，同样会使思想失去茁壮成长的土壤。

30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遭遇了政治暴力与话语暴力的双重挤压，其形态和种类虽然多元，但其理论基调却是政治，文学批评与理论论争多是围绕政治意识形态而行，其结果不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而是政治上的思想围攻，尤其是国共之间的文艺思想对攻。就权力支配的一般情形而言，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者的思想，因而一个社会的主导文艺话语与主流文艺话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30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界的情形恰与之相反：国民政府倡导的“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因缺乏深厚的哲学根基与现实感召力，无法进入民众心里，故其虽有话语主导权和支配权，却无思想引导力；受国府打击压抑的左翼文艺却深受民众欢迎，成为当时文艺话语的主流。主导者非主流，主流者非主导，这在中国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精神奇观。

非主导的左翼竟成为主流，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3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人习称“苏俄”）经济、政治的成功，让中国的知识界作出思想反思。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①。政府体制内的学者把共产主义革命看成是一种社会政治试验，甚至向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理论构想：“只要共产党肯放弃它攻城略地的政策，我们不妨让它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它共产主义的实验。”^②在政府辖下的学术体制内，竟然出现同情反对政府者的政治言论，这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国民政府对学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宽容。不管当时的国民政府出于何种考虑，这种宽容都给文人的思想表演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

①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33页。

② 丁文江：《废止内战的运动》，《独立评论》1932年11月6日第25号。

社会空间。正是这种社会空间的存在，不同种类的理论才能够在当时的精神舞台上，依据各自的逻辑理据，共存而又共争。

第三节 本研究对象的社会系统特征

从矛盾、斗争的角度看，文学场是一个权力场域；从联系、互渗、共存的角度看，“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①，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系统。文学场虽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斗争与较量的矛盾空间，但其场域内部诸因素依然能够共融共存。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文学场内的诸种因素会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地建立联系，从而使这一场域成为一个内部自治又与外部环境不断发生信息和思想交换的精神系统。

文学场具有一般社会文化系统的共有特征，这一特征就是系统构成因素在功能上的分化性。文学理论系统的功能分化主要表现为文学理论类型及文学话语功能的分化。文学理论类型的分化表现在：学院派的学者大多注重文学基本理论如概念和命题的相关辨析，作家型的批评家注重对文学理论具体问题的探讨。文学理论的话语功能分化表现在：政治文艺的鼓吹者注重文学的宣传功能，自由主义文人倡导文学的艺术和审美功能，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宣扬文学的道德和伦理功能。

文学场还具有一般社会文化系统共有的另一特征，那就是系统整体结构的自足性与结构运行的强制性。

文学系统整体结构的自足性表现为文学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机能，这种自我维持和自我调节能力让系统能够排除外来因素如政治等的强力干扰，维持自身特征的存在。比如，30 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介入与规训程度虽然很高，但它仍然没能把文学理论完全变成政治论文或政府的红头文件，因为那样做会使文学理论彻底失去读者市场，从而使文艺论文承载的政治宣传内容完全失效。就此而言，外在的他律因素不管如

^① [法]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2 页。

何强大，它都不可能把文学理论彻底非学术化，变成学术以外的东西。由此人们不难理解与此相应的现象：不管国民党领导下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它们在规训、引导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迁就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规律。具体来说，国府的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家和左翼文艺理论家在探讨各自的“主义”及文学的政治作用时，也不得不兼顾文学创作具体规律的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形象”、“典型”等的探讨即为例证。

文学系统运行时的结构强制性首先表现为商业生产规律下的“杂志办人”^①。“杂志办人”是指精神独立的文学主体因友情、组织、利益等的考虑不得不与相关杂志保持业务联系，甚至在与杂志经营者发生利益冲突时，也会勉力维持自己与相关杂志的合作关系。例如，傅东华主编《文学》杂志，鲁迅是该杂志的编委，并且是主要撰稿人，这份杂志“以鲁迅的声望为主要原因而在读者中间建立了威信”；后来二人产生矛盾，鲁迅愤然退出《文学》“编委”，不再向它投稿，结果双方一损俱损：“鲁迅退出了，《文学》当然受到了重大影响。傅东华不能不懂得，他这根独木是难于支持一座大厦的。当然由于茅盾的恳请，鲁迅还是答应了再向《文学》投稿。较之其他的，《文学》已经走到了较广大的读者里面。他只好恢复了向它出卖劳动力的地位。”^②文学系统运行时的结构强制性还表现为同人刊物对作者写作的隐性牵制。这种牵制，一旦圈内同人商定了杂志的办刊方向，以后大家就要按照事先的集体约定为之撰写稿件。作者虽然在意志上是独立的，但在艺术趣味上又是属于某个团体或小圈子的。

文学场也有自身的特殊系统特征。作为艺术场域内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文学场内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而又共融共生。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来看，如果没有自由主义者与政治文艺家之间的思想冲突，就不可能出现“京

^① 茅盾、梁实秋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出版界的情况时都使用过这一说法，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及《梁实秋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② 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派”这种文学现象；从客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如果没有国家分裂、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局面，就不会出现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激烈对抗；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共生情况来看，没有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左右两翼的文艺组织、文艺论战就不可能出现。文学场的系统特征还表现在：文学系统内任一因素的变化，都会在文学场内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影响文学理论客体环境的变化与文学理论性质及方向的变化。例如，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从而导致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但使国共之间的文艺对抗走向终结，也使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阵线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走向终结。

文学场还具有一般社会系统少有的主体性特征。文学是人学，文学理论史首先就是各具精神个性的理论个体以及相关群集主体对文学精神的塑造史，正是不同理论主体的个性差异，才有了千姿百态的理论文本。当然，文学场内的行为主体并非只有单个的行动个体一种类型，其他行为主体也是助进或促成理论生长的因素，如作为群集主体的文学团体、同人圈子、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事实上，群集主体对文学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单个的主体。例如，30 年代的重大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理论论争均为下述两种群集主体所推动：一是国共领导下的文艺社团，二是没有组织约束的文艺同人圈子。

第一章 20世纪30年代文学理论的生成语境

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应的生成语境，文学理论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像一般文学形式一样，文学理论的发展受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也就是文学理论赖以生成的社会语境，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鲁迅说各类文学形式如“诗歌，戏曲，小说”等的发展都“与社会条件相关联”^①，文学理论的发展又何尝不“与社会条件相关联”？就是以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新批评”理论家，也不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可以放弃。职是之故，论者在考察20世纪3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时，不能不遵循由外向内、循序以行的逻辑理路，先行考察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生成的诸种社会语境。

第一节 权力斗争与文学理论生态

在引论部分，著者曾谈到文学场的“系统”性质及相关特征。从系统论的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场就是一个特殊的精神生态系统。作为社会场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其发展必然受制于社会权力场的一般法则。社会权力场的核心因素是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与政党政治或政治集团又密不可分，因此，要考察20世纪30年代文学理论的生态状况，就必须全面考察该时期的社会政治斗争状况。以此为基础，方能对该时期的文学理论生态状况作出相对准确的解释和说明。

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情况异常复杂。在这一时段的政治权力格局中，

^① 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国民政府并不具有在全国的实际统治权。30 年代初期，“国民党的统治区域有限，蒋介石号令所及，仅东南数省而已”^①，具体一点说，“1929 年……国民政府仅控制了 8% 的国土和 20% 的人口”，直到 30 年代后期，也就是“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才控制了“中国 25% 的地区和 66% 的人口”，而且这样的统治也十分表面，因为“南京政府控制地区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军队指挥官对南京的忠诚是非常脆弱的”。^② 名义上的“中央陷于飘摇的局面”，“就政治方面来说，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已无从实施”，没有“一省的政治是诚意接受中央的命令……各省的大部分目中久无中央，较好的形式上还有交换的文书，等而下之无事不与中央作极端的反抗”，就经济方面来说，没有“一省的财政可以无条件的受中央的支配”，“两湖财政有两湖的独立，两广财政有两广的独立”。^③ 30 年代后期，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中国沦为日伪治下的沦陷区、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共产党治下的解放区三个行政区域。

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相应，30 年代中国的社会斗争也极为复杂。“帝国主义的列强和中国各地方各派各系的绅商……强夺民众膏血”^④，因此，中国社会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盘根错节，难解难分。在整个 30 年代，享有“治外法权”的上海公共租界区域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日本先是策动东北独立，继而蚕食中国内陆区域，后仍欲壑难填，干脆于 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算不清的老账新账。中共长期“工农武装割据”，称雄一方，更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国共两党的军事、政治斗争始终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斗争的焦点，双方“短兵相接的阵势太分明”，“红白战争一天天剧烈”，“所谓剿匪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要紧事情”^⑤。国民党在对付国内其他政治势力时易如反掌，但在对付共产党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见功效。因为共产党不是单个人或某

① 杨者圣：《特工老板徐恩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6 页。

② 易劳逸：《1927—1937 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1 页。

③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1928 年第 1 期。

④ 史铁儿：《屠夫文学》，《前哨》1931 年第 1 卷第 3 期。

⑤ 同上。